

## 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 近年西藏史前史研究新趋势<sup>\*</sup>

霍 巍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与环境条件，这片土地素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的禁区”。人类究竟何时开始踏上西藏高原？他们又是如何在这里生存繁衍下来的？这些涉及早期人类开发西藏高原的历史，长期以来扑朔迷离，被厚重的神话与传说织成的帷幕所遮盖。用科学史实揭开西藏早期历史的神秘面纱，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之一，而一部科学的西藏史前史不仅是西藏地方史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上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出现的新的研究趋势值得关注。

### 一、什么是西藏史前史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史上在文字诞生之前、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都可以称为“史前史”。但是具体到西藏地区而言，什么是早于西藏历史时期的“西藏史前史”，国内外学术界从来就有不同认识与表述，我们可以大体将其归纳为三种情况：

#### （一）以佛教传入西藏为标志

意大利学者 G. 杜齐（G. Tucci）在《西藏考古》第一章“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中，是这样来划分的：“在当前缺少论点明确的参考文献及可以确定年代的实物的情况下……史前时期与有史时期的划分必然是不确切的，两个时期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武断划分的。根据汉文文献提供的早期史料及后期第一批被称为藏文资料的文稿，我们才了解到西藏的可靠历史是始于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时期；然而只有经过系统的发掘，我们才能确定出这一章中讨论的所有文物是否都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前的年代。”<sup>①</sup> 奥地利学者霍夫曼（H. Hoffmann）也认为，在西藏系统的考古发掘尚未展开之前，史前（pre）与早期（early）历史之间的界线很难划分，只能以佛教传入西藏或者松赞干布统一高原为界，此前都为史前史（prehistory）与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此后则是西藏中古史的开始。<sup>②</sup> 基于这一认识，也有西方学者采用“前佛教时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初步研究”（项目批准号 11&ZD121）系列成果之一。

<sup>①</sup> G. 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笈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5 页。

<sup>②</sup> H. Hoffmann, “Early and Medieval Tibet,”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期”这一概念来指称西藏史前史，如杜齐、<sup>①</sup> 石泰安、<sup>②</sup> Nebesky-Wojkowitz、<sup>③</sup> Chayet 等。<sup>④</sup> 近年来的西方学者中，尤以 Bellezza 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最为广泛。<sup>⑤</sup>

## （二）以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并创立藏文字为标志

中国学者张云认为，西藏古代文明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时期，第一个阶段即前吐蕃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古时期”或者“史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吐蕃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 7 至 9 世纪；第三个阶段是佛教文化时期。<sup>⑥</sup> 侯石柱也认为：“西藏可追溯的文字历史大约从吐蕃王朝开始，即公元 6 世纪……那么公元 6 世纪以前确切的西藏历史靠什么来证实呢，这主要靠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来解决。”<sup>⑦</sup>

## （三）考古学分期法

当西方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按照考古发掘出土物的质地，将其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丹麦学者汤姆森（C. J. Thomsen）在 1848 年的《北方古物入门》（*A Guide to Northern Antiquities*）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书中指出，博物馆的藏品可以依次按照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进行划分。整个欧洲的学者很快就发现这个分类非常有用。后来，石器时代又被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些术语在非洲和美洲不太适用，因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没有使用过铜器，而在美洲铜器并不重要，铁器的使用则要晚到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后。尽管如此，这个划分意义十分重大，被世界考古学界称为“三期说”并在大部分地区采用。三期说确立了一个原则，即通过史前遗物的研究和分类，可以提出一个编年序列，进而探讨各个时期的问题。<sup>⑧</sup>

中国考古学家童恩正最早将这个分期法导入到西藏考古领域。他认为：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在什么时期传入的，这些问题由于资料限制都一时无法回答，也无法从考古学上划出独立的铜器时代，所以建议在石器时代之后暂时采取“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根据最概括的推测，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sup>⑨</sup> 这个划分时代的方法，实际上就将西藏的石器时

①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Rise of the Mongo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71-399.

② G. 杜齐：《西藏考古》，第 4—5 页。

③ R. A.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印，1985 年。

④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⑤ A. Chayet, *Art et Archeologie du Tibet*, Paris: Picard, 1994.

⑥ 参见 John Vincent Bellezza,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Tibet: 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the High Plateau (Findings of the Changthang Circuit Expedition, 1999)*,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2001; John Vincent Bellezza, *Antiquities of Upper Tibet: An Inventory of 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High Plateau (Findings of the Upper Tibet Circumnavigation Expedition, 2000)*,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2002.

⑦ 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⑧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页。

⑨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25 页。

⑩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 年第 9 期。

代和早期金属器时代一并划入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史前时代。

事实上,在上述各种不同表述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到人们对“史前史”时代上下限的划定。例如,若以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划线,就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佛教传入西藏的准确年代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佛教是公元7世纪才分别由唐王朝和尼婆罗王朝从东西两个方向传入吐蕃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西藏的年代不排除有可能会更早,或可早到公元5世纪左右。<sup>①</sup>又如,若以吐蕃王朝建立以及藏文字创立划线,那么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吐蕃部落及其以悉补野部为核心所建立的雅隆王朝实际上也可视为吐蕃王朝的前身;加以对藏文字何时创立也有不同意见,<sup>②</sup>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也存在疑问。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对于西藏史前史的理解并没有统一认识,前述“早期历史”、“上古史”、“前佛教时期”等概念,都试图以某种标志物来划分西藏史前与历史时期的界线,但由于选定的“标志物”本身在内涵与外延上游移不定,就难免在概念上造成含混。相对而言,童恩正提出的“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考古学概念,其中既包括青铜时代,也应包括欧亚考古学上常常使用的“早期铁器时代”在内,如果再加上此前的石器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可以基本上从物质形态上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标准和范围,来区分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历史。因此,目前西藏考古学界基本上还是采用这个方法来标定西藏史前史的时间范畴,即将考古学上西藏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直到早期金属时代这段时间都视为西藏史前史,时代下限为公元6世纪后期;而将以松赞干布为第一代赞普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时期视为西藏历史时期之始,时代上限为公元7世纪初期。当然,这种直接将考古学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年代概念的方法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同将某个考古学文化与某个民族的族属直接挂钩一样,都存在危险性,只是相对于其他概念而言稍显合理而已。

## 二、西藏史前史研究回顾

迄今为止的西藏史前史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是主要依托文献记载进行的历史研究;一是以科学的田野考察为依托进行的综合研究。前者的关注点实际上主要集中在藏族族源问题上,对西藏史前社会其他方面的问题几无涉及;而后者的涉及面虽然还不十分系统,但却要广泛得多。

### (一) 汉藏文献中的西藏史前史观

在汉藏历史文献记载中,都形成了有关西藏史前史的固有叙事模式。汉族史家多根据两唐书之《吐蕃传》记载,认为“吐蕃本西羌属”,最早的藏族先民是从古代羌人的支系“发羌”、“唐牂”等迁移到西藏高原,然后繁衍成其后代吐蕃的。从宋人欧阳修、宋祁提出此说之后,近

① 有关争议参见霍巍:《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关于藏文字的创立,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如有学者认为早在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在西藏西部已有年代更为古老的象雄文字,后来的藏文是在象雄文字的基础之上经过改造而形成的。参见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世学者如顾颉刚、<sup>①</sup> 任乃强、<sup>②</sup> 方国瑜、<sup>③</sup>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sup>④</sup>等皆从此说，这个基本观点还被一些汉文历史著作如《藏族简史》等采纳。<sup>⑤</sup> 而藏族史家也有其固有历史观。如同石泰安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公元六世纪末之前的阶段，不可能确定吐蕃任何能推论出年代的历史。但西藏人在这一问题上却有他们自己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神话和传奇故事。”<sup>⑥</sup> 这些神话和传奇故事遵循着一个古老的叙事模式，或认为西藏最早的人类都是一批光明灿烂的天神，自天而降人世；或认为吐蕃人的先祖是猕猴与罗刹女交配产生的后代，最初诞生于山南雅砻地区。受佛教传播的影响，后来还有各种关于藏族起源的神话与传说流行，这些观点在公元 14 世纪以后形成的许多藏文历史著作中都屡见不鲜。

## （二）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影响

西方学者最早开始利用地下考古材料来重新认识西藏史前史。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意大利藏学家 G. 杜齐教授，他在《西藏考古》一书中便列举出西藏聂拉木某河床中发掘出土的人骨材料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还推测有一些洞穴可能是史前时期人类居住的遗址。<sup>⑦</sup> 另一位西方学者弗兰克（A. H. Francke）也曾在西藏西部的邻近地区开展过一些零星的田野考古工作，如在拉达克发现一处立石遗迹，在列城和 Rgry 两处发现过早期墓地。<sup>⑧</sup> 1925—1928 年，N. 罗列赫（N. Roerich）组建一支中亚探险队，在西藏的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藏北，最西边大概到萨嘎一带。据后来披露，这次调查的主要收获有墓葬、巨石遗迹、动物纹器物。<sup>⑨</sup> 除此之外，杜齐、罗列赫等人还在石丘墓、大石遗迹分布的范围以内发现过一些现代游牧部落使用的青铜质的饰件和小件的生活用品，上面多饰有传统的动物纹饰，包括鹿、鹰、马、鸟、熊等，杜齐认为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佛教传入以前西藏一种土著文化的遗留”。<sup>⑩</sup> 罗列赫指出要注意“在佛教的西藏旁边还有一个游牧民的西藏，即格萨尔王的西藏和牧民英雄史诗”。<sup>⑪</sup> 虽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个时期西方学者在西藏本土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极其有限，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更是几乎为零，无法为深入认识西藏史前史提供更多可靠翔实材料，但是他们独到的科学眼光和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突破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sup>⑫</sup>

## （三）考古学的整体介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虽然在地质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中陆续开始发现一些史前时期的石器、墓葬等考古遗存，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整体介入到藏学研究领域并对西藏史前史研究起

①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1 期。

②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年，第 40 页。

③ 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33—34 页。

④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89 页。

⑤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3 页。

⑥ R. A.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 33 页。

⑦ G. 杜齐：《西藏考古》，第 4 页。

⑧ A. H. Francke,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London: Partridge, 1907.

⑨ N. Roerich, *Altai-Himalaya: A Travel Diary*,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1929.

⑩ G. 杜齐：《西藏考古》，第 6—11 页；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 年第 9 期。

⑪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 年第 9 期。

⑫ 甲央、霍巍：《20 世纪西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1 年第 6 期。

到主导作用,则是从藏东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拉开序幕的。<sup>①</sup>由于卡若遗址发掘面积较大、出土遗物众多、文化现象丰富,并且有精确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作为科学支撑,首次将西藏史前史上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开启了以科学的田野考察为依托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从此以后的西藏上古史撰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前一阶段基于历史文献的文本书写模式的影响,但都会无一例外地公认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化的开端,以考古学材料复原史前史的路径与理论方法开始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有关西藏史前史的重要考古发现包括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sup>②</sup>昌都小恩达遗址、邦嘎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达龙查遗址、堆龙德庆县古荣镇嘎冲遗址、当雄县羊八井加日塘遗址等史前遗址的调查发现与试掘以及昌都卡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sup>③</sup>西藏西部札达县卡尔普墓地、<sup>④</sup>皮央·东嘎三处墓地的发掘以及格布赛路墓地的调查、噶尔县穹隆银城遗址以及附近一批属于史前时期遗迹的调查与试掘等。<sup>⑤</sup>上述工作不仅为认识青藏高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专业数据,也从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作物种类、精神生活、原始信仰与艺术等层面为西藏史前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之下,西藏史前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一些基于考古学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归纳为几种不同类型与表述方式:

其一,对西藏史前考古材料本身的研究与认识。这方面的论著均由考古学者撰著,多以考古发掘报告、调查报告以及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形式发表。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报告如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撰著的《昌都卡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拉萨曲贡》<sup>⑥</sup>等,都包含丰富的考古材料。还有许多考古学者根据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撰著大量研究论文,<sup>⑦</sup>成为西藏史前史研究可靠的基础性材料。

① 有关情况参见霍巍:《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历史性转折——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而作》,《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霍巍:《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西藏文管会(侯石柱):《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文物》1985年第9期;《概述近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3—292页;更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成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15—427页;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9年第9期;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9—2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③ 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④ 此处墓地的正式考古调查资料尚未公开发表,但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编著的《宝藏》一书中有对墓地出土陶器照片的公布。(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宝藏》第1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

⑤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拉巴平措等:《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 and 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0—34页。

⑥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

⑦ 限于篇幅,此处对这些论文不再一一列举,有关内容将在后文论及。

其二，利用考古材料对西藏史前不同方面展开专题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如侯光良等《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三次扩张与环境演变》、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白玛措《从考古遗迹看藏族先民的文化生活》、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张亚生《对西藏青作农业起源的再认识》<sup>①</sup>等等，从题目即可看出，由于西藏史前时期考古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推动和促进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认识西藏史前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虽然目前发表的论著还不多，但这一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却已十分明显。

其三，一部分学术专著中对西藏史前史提出总体性认识。如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一书，虽然其主旨是研究西藏古代文明与波斯的关系，但从其书名即可知道，他已明确提出“上古西藏”这个概念。按照他的认识，所谓“上古时期”就是史前时期，亦即前吐蕃时期。他在此书导论中指出，之所以把前吐蕃时期称作上古时期或者史前时期，主要是因为从吐蕃时期石刻和唐代汉文文献，以及后弘期的藏文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吐蕃王朝以前吐蕃没有成熟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吐蕃王朝以前的吐蕃历史缺乏可靠的历史年表，各部落依然处于分立状态，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尚未形成统一的面貌和共有的特征，这一切都是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才完成的。他进而概括西藏上古文明的特点是：以原始民间信仰和地方宗教——本教为中心的精神文明；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明和不断进步为特征的物质文明；以王权的产生和强化为核心的制度文明；以堡寨碉房建筑为特征的上古城市文明。<sup>②</sup>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一书，以佛教传入西藏为界，把此前的古代艺术发展期称为“原始艺术阶段”，认为其大致包括历史学与考古学通常所认定的三个时段，即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年代“大约从距今五万年左右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至吐蕃王朝建立前的公元六世纪左右”，<sup>③</sup>对这个时期的石器艺术、人体装饰品、陶器艺术、岩画艺术、大石遗迹、原始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西藏史前艺术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由藏族学者撰写的一些通史性著作中，也开始利用科学考古出土资料，与文献和传说相互结合阐释西藏远古历史。如恰白·次旦平措等学者合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一书第1章“西藏远古历史”，专门列出“关于藏族入种起源的有关出土文物”一节，列举从西藏聂拉木、定日、申扎、墨脱、昌都等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的出土文物，对藏民族在西藏高原的起源与发展做出评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早就有形成并发展为人类的民族，藏族是由此形成的，绝非从其他地方迁移来的，但是，藏民族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如果从民族成分方面讲，不只是一种成分，而是一个拥有多种成分的民族。”<sup>④</sup>

格勒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一书第2章“藏族及其古代文化的来源”中，对远古西藏高原是否有人类居住、藏族的体质特征及种族来源等问题进行讨论，提

① 侯光良、许长军、樊启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三次扩张与环境演变》，《地理学报》2010年第1期；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白玛措：《从考古遗迹看藏族先民的文化生活》，《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199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张亚生：《对西藏青作农业起源的再认识》，《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3—4页。

③ 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④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15页。

出“藏族文化是以藏南谷地的土著文化为基础,同时吸收和融合中华大地上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游牧文化和胡系统的游牧民族、中原地区的原始仰韶文化和氏羌系统的民族而形成的”这样一个基本认识,<sup>①</sup>试图勾勒出西藏早期历史的初始阶段文化特征,其主要依据也是来源于西藏新发现的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学资料。

上述这个阶段,是西藏史前史研究学术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它既有对过去研究传统的尊重与继承,但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它进一步拓展西藏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并及时地将新的考古材料科学地运用到史前史研究中,形成科学的研究路径、理论方法与具体实践案例,使得研究局面发生革命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较为彻底地摒弃旧的西藏史前史观,朝着建立新的理论模式和史前史框架迈进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

### 三、近年来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西藏史前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活跃,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成都联合召开的“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希望形成一种“跨地域、跨学科、跨语种的学术研究氛围,对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及其相邻区域史前文明的讨论能产生积极和有益的影响”,<sup>②</sup>从会议议题的设定即可窥见这个发展阶段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动态与关注点集中在:青藏高原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考古新发现;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及其人类活动;青藏高原的农业起源与传播;高原畜牧业起源和动物驯化;高原采集狩猎和低地农业的文化互动;岩画及其欧亚大陆的联系;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跨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互动,等等,几乎涵盖西藏史前史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域。参会者所提交的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西藏史前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sup>③</sup>它们大体可以按照主题初步归纳为四个方面。

#### (一) 青藏高原的古环境变迁与人类起源

青藏高原人类起源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它早已突破考古学单一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研究成为新的研究趋势。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遗传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宿兵在《青藏高原人群的起源和高原适应的遗传学研究》一文中提出,现代人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遗传学研究表明,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最早到达东亚大陆的南方,而后在大约3—2.5万年前左右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由南向北的人群迁徙,从而使现代人遍布东亚大陆。但在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中存在着一种东亚特有、分布奇特的单倍型—D174单倍型(又称YAP单倍型),它起源于东亚的南部,其由南向北的迁徙大约发生在距今6—5万年前,远远早于发生在3—2.5万年前左右的那次大迁徙,可能是发生在

① 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5页。

② 此次会议有关资料均来自四川大学:《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手册与提要》(内部资料),成都,2011年。本节中所引论文均出自此,下文不再重复注释。

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次会议涉及的地域范围虽然是整个青藏高原,青海与西藏的远古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青海的地理环境不完全等同于西藏,而青海地区史前史研究与西藏地区相比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进程,所以本节中虽采用会议设定的“青藏高原”这一概念,但关注重心与聚焦点仍在西藏而不是青海。

东亚大陆最早的大规模现代人群的迁徙，而这种单倍体在中国的藏族、日本人和东南亚阿德曼群岛人群中有很高的频率（ $\geq 30\%$ ），由此推测藏族祖先进入并定居青藏高原的时间可能非常早，距今约 3 万年前左右，而且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对高原缺氧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力，通过对 EPASI 基因的全测序分析，发现这个基因在藏族人群中发生了很强的自然选择，选择时间大约至少在 1.8 万年以上。这一结果从分子水平初步揭示了藏族高原适应的遗传学机制。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赖忠平、孙永娟、侯光良等人的论文《史前人类何时进入青藏高原：释光和碳十四测年结果》则运用光释光和碳十四方法对青海湖地区发现的史前灶坑进行测年，得出的年代说明这一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发生在距今 1.3—1.1 万年前的全新世早期，而不是以前提出的 4—3 万年前。但文中也承认，对于青藏高原上的早期人类活动，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可以早到距今 4—3 万年前，处于末次冰期的中间阶段，例如，在青海色林错和小柴达木湖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两个遗址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年被断定在距今 4—3 万年，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在拉萨附近的遗址中可以找到在末次冰盛期期间有人类活动证据，年代为距今 2 万年。

人类早期对高原的拓殖与高原古代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受到不同学科的高度关注。随着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与全球性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发展历程与环境事实也日益显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青藏高原对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影响》一文认为，早在更新世之初，青藏高原两侧早期人类所使用的是同样的石核—砍砸器技术，显示出高原两侧有较为方便的往来通道与交流，至早更新世晚期及中更新世之初，两侧的文化差别则越来越大，这种变化正好与青藏高原的进一步隆起相关，此时青藏高原隆升到 3000 米以上，并且进入冰冻圈，这个高度不仅直接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往来，还进一步影响到全球性环境变化，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干旱化。由此开始，中国与旧大陆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才走上不同道路。东西方文化差别最显著的时期当属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之初，此时高原已隆升达 4000 米，东西方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晚更新世晚期，石叶与细石器技术开始出现在中国北方，标志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新开始，现代人的智力与技术绕经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进入到华北地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年代研究进展》一文通过对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碳十四数据的再分析，将其与遗址的时间分布以及与周边区域相关遗址年代进行比较，结合已发表的有关青藏高原几千年来气候演化信息，进一步探讨青藏高原地区距今 4000 年气候干冷事件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

## （二）关于早期人类的生存活动方式

在人类进入到青藏高原之后，又是如何适应环境，在高海拔地区生存活动的？这也是学术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Ofer Bar-Yosef 教授从宏观视野出发，在题为《农民、牧民及狩猎采集者相互关系的考古学解读》一文中，以区域研究个案为例，认为农业扩展是以狩猎采集者退居边缘地带为代价的，而牧民——无论是由农业人群还是畜牧人群分化出来的，都势必对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产生影响。从考古学角度来解读这些不同社群之间的变换并非易事，需要注意这些群体间可能存在的不同经济和社会结构，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更多生产资料混合的潜在可能性，从动物骨骼、种子、果实、居址与营地等各种遗迹和遗物现象中去加以观察与区别。他提出的这个理论模式对于考察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的生业形态与混合经济状况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玳玉《青藏高原早期农业：植物考古研究回顾》一文从考古学证据



回顾从植物考古的发现来探索最早适应高原高海拔环境的农作物种类以及出现的地点,认为青藏高原最早人工培育的作物是小米,可能是通过川西或青海北部进入到高原东部的,大麦和荞麦这两种高原传统农作物传入的时间可能稍晚,约为公元前第二千纪;裸大麦(青稞)最早可能是从西南亚或者中亚传入,那里的人们在科佩特山脉、帕米尔高原或者印度北部种植这些作物;皮大麦是在铁器时代(前500)通过与中亚游牧民族的接触而引入高原。通过对考古遗址内保存的大量植物遗存的研究,可以追索高原经济形态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

德国马堡大学的 Georg Miehe 和刘建全两位学者的论文《如何追寻青藏高原畜牧业的起源:生态学家视角》则通过对人类用火遗迹及可燃物质的考古学观察,考察在青藏高原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下,人们对火的利用来适应环境并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也影响到高原环境的人地关系演化史,得出的结论认为自全新世易燃生物被人类利用以来,早期狩猎者已经开始改变所处的环境;由此推演可知,青藏高原的畜牧史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7000年前。

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与艺术创造的其他方面。如四川大学霍巍《西藏早期人类居住形态的考古学观察》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的梳理,分别考察定居性质的原始村落、游牧人群临时性或季节性的营地、史前大型聚落朝着城址发展的线条等问题。四川大学李永宪《西藏史前岩画的地域特征》统计青藏高原80处以上的史前岩画,将其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认为早期岩画被认为是吐蕃王朝和佛教文化之前的产物,是高原史前游牧文化的构成部分,它们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西部地区;而晚期岩画则以洞穴彩绘岩画为多,主要分布在羌塘高原湖滨地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的 Christine Lee 的论文《古病理学所见西宁陶家寨墓地墓主的战士生活方式》通过古病理学来检测墓葬出土人骨的创伤、传染性疾病、牙科病理、关节炎以及随葬的武器,考察当时人类所从事的活动类型与生活方式。

### (三) 考古新发现与地域史前史的重构

利用新考古材料不断丰富不同地域史前文化的内容,从而重构各地域史前史,成为各国研究者的一致目标。不丹王国不丹研究中心的 Dorji Penjore 博士在《以考古发现构建不丹史前史》中指出,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古老文明之间的不丹,早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从田野发现的石器可以证明这一点,不丹的史前史面貌丰富,可以通过史前人工制品的发现、人类居住的早期洞穴、巨石文化等不同的方面得到反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西藏研究中心的 John Vincent Bellezza 在《近期象雄考古发现:藏西北铁器、原史及早期历史时期的遗迹及岩画》一文中,回顾他16年来在西藏西部和羌塘地区调查所获的大量考古资料,分析西藏西部地区文明史的演进以及与欧亚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在未来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美国内华达州考古学系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史前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黄河上游谷地史前遗址调查及测年的案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青藏高原东麓20个史前遗址的碳十四测年以及地貌环境分析,研究其时空分布演变过程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认为这个区域史前文化演进经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中对水源的需求、气候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变化等都影响到人类逐步向高海拔地区的拓殖。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陈祖军《西藏墨脱县发现多处磨制石器地点》、夏格旺堆《西藏中部和东南部新发现的三处岩画地点》、哈比布《2006—2011年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情况》、李林辉《西藏阿里地区考古新发现——曲踏墓地》、南京师范大学汤惠生等《昆仑山山口发现的细石器新材料》一组论文则以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充实了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 (四) 跨文化比较研究

高原史前史研究需要宽广的国际视野，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是跨文化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者们的倡导，在肯定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独立性的同时，也注意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如四川大学吕红亮《跨喜马拉雅的史前文化互动》一文指出：“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至少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喜马拉雅南北坡的石器工业有着技术的交汇；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克什米尔河谷以至巴基斯坦北部的高山河谷区域的定居农业聚落，一方面受到西亚、中亚地区的影响，同时也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早期金属时代，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更为密切，并显示出与广义中亚地区的文化联系。”他列举西藏西部地区在陶器传统、带柄铜镜、床式木棺、斯基泰动物纹饰、动物殉葬习俗等各项考古遗存与欧亚文明之间的联系，认为这些证据“反映出中亚游牧民族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曾进入西喜马拉雅高山地带，西喜马拉雅高山地带表现出的中亚文化因素可能与公元前第一千纪活动于中亚东部的游牧塞人相关，游牧人和西藏西南部的畜牧人群的交换贸易是跨西喜马拉雅文化互动的主要机制”。

岩居和岩洞葬一直是西喜马拉雅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印度 HNB 加瓦大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系 Vinod Nautiyal《喜马拉雅地区马拉日岩洞葬的地球物理考古研究》将印度北阿肯德邦境内发现的史前岩洞葬与西藏西部古格地区和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岩洞葬作了比较，指出它们在早期青藏高原部落的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意义。该大学另一位学者 R. C. Bhatt 在《喜马拉雅山地区马拉日洞穴葬新发现：金面具与陶器传统》一文中以出土陶器和一具金箔面具为例，讨论喜马拉雅地区史前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与印度学者相呼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学院的 Mark Aldenderfer 和尼泊尔王国考古部的 Mohan Singh Lama 也发表《尼泊尔北穆斯塘地区的喜马拉雅移民》，列举与印度马拉日岩洞葬相似的黄金箔面具与陶器，证明从青藏高原到这一地区深谷中显著的人群迁徙的证据存在，认为早在距今 5000 年前，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第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出现在距今约 3000 年以前，其后出现在公元 1200 年，这种趋向河谷地带的稳定而缓慢的迁徙一直持续到公元 1600 年。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的 Muhammad Ashraf Khan 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地区的史前岩洞和岩穴的最新调查发现》一文中，则对处于斯瓦特河谷、哈扎尔高地与旁遮普冲积平原之间过渡地带发现的史前岩洞葬进行研究比较，认为在拉瓦尔品第地区日瓦特和索安河流域发现的陶器与石器表明，从远古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人类史前史上便占有重要地位，并再次显示出人类早期以岩穴为居的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

荷兰莱顿大学喜马拉雅语言项目、印度考古学会的 Manjil Hazarika 在《印度东北部晚更新世考古记录及其与喜马拉雅周边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中指出，现有的更新世晚期考古资料和印度东北部生物地理状况显示，史前人类可能通过喜马拉雅东部山脚地带的移动，通过四川、云南沿雅鲁藏布江迁徙到低海拔的河流冲积平原以及周边山地，这从语言学和考古学两方面均可得到证据，中国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印度东北部新石器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史前沿青藏高原东麓的文化迁徙与互动》一文指出，距今 6000 年以降，地处中原的仰韶中期文化（庙底沟期）开始向四处扩张，这一现象对中国西部史前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所引发的结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西北的文化拓殖促成早期东西方的文化交互；二是向西南的文化拓殖不仅促进巴蜀两地史前文化的发展，并由此波及云贵高原、东南亚；三是沿青藏高原东麓的族群迁徙促成中国西北与西南的文化互动，并导

致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对接,也将中亚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剑《青藏高原东麓彩陶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回顾四川西北部高原近一个世纪以来彩陶的发现与空间分布特征,对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以及川西北哈休、营盘山等8个史前遗址中出土的170件彩陶标本进行化学元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彩陶标本的化学成分明显与当地所出的非彩陶标本不同,而与甘肃彩陶标本相一致,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动因显然与人群的移动迁徙有关。

青藏高原史前文化与周边地区联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通道,是通过西藏西部与南疆之间的交通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涛《从新出考古资料看“前吐蕃时期”藏西与南疆之文化联系——噶县门土乡卡尔东墓地发现的意义》一文从该墓地中出土的箱式木棺、带有“王侯”字样的禽兽纹丝绸残片、陶器和青铜器等遗物入手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其受到来自南疆汉晋时期汉文化的影响,应视为丝绸之路南线向青藏高原的一条分支和延伸。

综上所述,这次国际性青藏高原史前研究会议犹如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观察和认识到当前西藏高原史前史研究发展的一些新的动态与趋势,可扼要概括为下述各点:

其一,从阐释路径而言,以科学的考古资料作为史前史研究与叙事基础的导向更加巩固,旧有的主要依赖后期文献与传说史料来构建西藏史前史的传统模式已经日渐式微,重视田野调查与作业,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学术价值取向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其二,相关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更加多样化,开始突破考古学、历史学等单一学科的界限,多学科紧密结合开展综合与交叉研究的特点越趋明显,开始形成诸如西藏高原人类起源研究、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居住环境研究、西藏高原农业起源与作物传播史研究、西藏史前原始宗教与艺术研究等若干“问题域”,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态势初步形成并已取得显著成效。其三,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对西藏高原史前人类与文化的整体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提高,人们已经不再将西藏高原视为一座“文化孤岛”将其与周边文化割裂开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整个“环喜马拉雅山”地带中的一环加以重新认识和理解;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各个地域史前史的重构目标日益明确,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回顾近百年来西藏史前史研究的历程,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研究范式的转变和阐释路径的变革。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特色正在不断加强,理论与方法更趋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主要依托文献记载进行的历史研究朝着以科学的田野考古为依托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一部基于科学史料的西藏史前史的基本框架已经有望形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西藏史前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和重要内容上,如藏文文献中所载松赞干布以前各“小邦”的历史、雅隆部落在松赞干布以前的历史、本教的早期历史等方面,目前的研究仍未能充分涉及,还有深入探索的极大空间,但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就一定会取得超越前人的新的进展和突破。

〔作者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辑:李红岩)